

修寺)。徐练伯摄

▼原浙江大学理学院在湘潭时期校舍之一（双

学家苏步青同志近影。徐练伯摄

▲原浙江大学教授、现复旦大学名誉校长、数





▲一九八四年八月，原浙大部分校友来绍兴参加遵湖时期革命斗争史座谈会签名。



▲绍兴县城附近的东南村，是当时浙大师生课余游憩之地。此系浙大部分校友来绍兴时旧地重游。

目 录

- 一、浙大地下党和革命学生在遵湄时期
的斗争概述……………李 晨
- 二、1940年—1942年浙大“马列主义
小组”在湄潭的活动……………李育农
- 三、难忘的岁月……………陈耀寰
- 四、重访湄潭记实……………钱 熙
- 五、记浙江大学“马列主义小组”
……………陈天保 周嘉鹏 庞曾湫
- 六、浙大在遵湄时期发表《国是宣言》
的历史条件及其经过与影响……………程融矩
- 七、回忆浙大湄潭分部学生运动
1942年夏—1946、5月……………潘 寰
- 八、记浙大永兴分部学运情况……………李景先

- 九、回忆我们的母校……………胡 颖 李成杰
- 十、对浙江大学学生运动的几点看法…周志成
- 十一、浙大永兴分部的学生运动……………李 骥
- 十二、回忆浙大1940—1942年的
学生运动……………黄宗甄
- 十三、湄潭浙大学生运动情况的
片断回忆……………赵梦瑞
- 十四、一次难忘的会见……………曾庆于 徐练伯
- 十五、积极做好“浙大”在湄潭时期的
史料征集工作……………洪 星

浙大地下党和革命 学生在遵湄时期的斗争概述

浙江大学校友 李 晨
中共北京市委原教育部长

大家让我开头、我就奉命先开个头。

非常感谢遵义地委、湄潭县委的同志，召开这样一个会，使我们这些离开娘家，离开第二故乡四十年左右的浙大老同学，能够回来聚在一起回忆一下当年在遵义、湄潭浙大的一些情况，我们的心情是十分激动的。

我们现在都是年过花甲的人了（鲁阳同志还年轻一点，五十八岁），这个第二故乡对我们有特殊的意义。当年在遵义、湄潭时期，在座的同志都是在这里学习、工作、参加战斗、得到锻炼的，很多浙大同学都是在这里打的基

础。我讲的基础是指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大学各专业的文化科学理论知识的基础，使他们在解放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能起点作用；另一方面是通过这一段的学习、工作和斗争，确定了许多同学的革命的政治方向。这一个时期，从党的历史说，正处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这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对我们的学习、工作、参加战斗、得到锻炼，这个历史条件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浙大是一九四〇年初迁来的，住遵义、湄潭、永兴三个地方，一九四六年夏迁回杭州。遵湄一带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曾经播下了很多革命种子，影响非常大。举一个例子，我是一九四三年化名李振铭到浙大上学的。我原在云南工作，后来到了南方局，就派我来贵州。一九四二年春先到安顺，一九四三年到湄潭永兴浙大新生部。那时候从湄潭到永兴没有

车，请一个挑夫挑行李。我看过《西行漫记》。知道红军长征路线大概是经过这里的，就打算从挑夫那里了解些情况。开始那挑夫不吭声，后来他了解到我是到浙大念书的，是个穷学生，就和我谈了起来。原来他是当年为红军搞过运输的。他一路跟我讲，红军从哪儿翻过山岗，从哪个山头走去，一直讲到我们到达永兴镇。浙大同学在这里还看到过红军墓。我们到金顶山玩的时候，路过一个小村庄喝茶，见木板门都是熏黑了的，仔细一看，还可以看到“红军万岁”的标语。从这几件事看，长征确实是播种机，播下了许多革命种子，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浙大本身是有革命传统的。从“一二·九”运动，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学生运动是不断的。迁到贵州以后，虽然贵州是国民党中央的嫡系力量统治，白色恐怖特别严重，跟当时的

四川、云南都不一样，可是就在这个白色恐怖的环境里，浙大仍然有不少进步同学在进行革命活动，甚至还有“拓荒社”（马列主义小组）这样的基干性组织，在进步学生中起着类似抗战初期民先队那样的领导核心作用（这个社从一九四〇年起的几位负责同志都来了，详细情况请他们讲）。当时还有些失掉组织联系的党员也在起作用。有些进步同学直接与《新华日报》联系，那时朱语今同志就在《新华日报》社，他们在浙大建立了“据点”。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很难成立半公开的进步团体，只有建立小型的三五成群、有名或无名的组织，同《新华日报》、南方局青年组有这样那样的联系而成为“据点”。“据点”这个名称还是周恩来同志亲自定的，意思是说，我们在敌后可以搞据点，当然也可以在国民党统治区搞些据点。

一九四二年春开始，浙大形势有了变化，南方局派人到贵州重新建立党组织，其中浙大是重点。从此，浙大在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了几年的艰苦曲折的斗争。浙大党组织是在上述这样的基础上开展工作的，不是从零开始。这个时期，党中央向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提出的总方针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还有“发展进步力量，团结中间力量，孤立反动势力。”浙大的党组织是坚决贯彻执行了这个方针的，因而是取得成效的。浙大在一九四六年从贵州迁回杭州时，随着政治形势的迅速发展，学生运动也迅速发展起来，在遵湄地区开展工作的基础上，党的组织也迅速发展几十人，有力地领导了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形成了当时在蒋管区第二条战线的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先讲这样一个轮廓。为了叙述方便，我

分三段来谈：第一段是一九四〇年初到一九四二年夏；第二段是从一九四二年夏南方局派人到浙大建立党组织到一九四四年冬，这个时期浙大学生运动从低潮开始转入高潮；第三段是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六年夏天，学生运动一直不断，直到浙大离开贵州。

一 一九四〇年初到一九四二年夏

开始，由于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尚有进步团体如黑白文艺社等进行活动，且比较活跃，立即引起了贵州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严密注意。这段时间，贵州省地下党正遭到大破坏，省工委负责人秦天真、邓止戈同志先后撤回延安；黄大陆、肖次瞻等同志先后被杀害；湄潭县总支书记陈光型同志也是这时由于叛徒出卖被捕牺牲的。大批党员疏散出省，一批党员分散到农村隐蔽，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国民

党反动派这时已在严密监视浙大的进步活动，阴谋策划打算采取镇压措施。

一九四二年初的“倒孔运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香港沦陷，许多知名人士困在香港，而孔祥熙的“二小姐”等家属却从香港用飞机带洋狗到重庆，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慨，浙大举行游行抗议），给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借口。于是“倒孔运动”以后，反动派趁机把魔爪伸进浙大，开始逮捕同学和教师。“黑白文艺社”等较进步的社团被迫停止活动。国民党很注意黑白文艺社，他们认为里边一定有共产党员，被捕的何友谅就是当时黑白文艺社的社长。

其实当时起核心领导作用的秘密的“拓荒社”却没有受到损失。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正在改变组织形式，尽力使其变得精干隐蔽，采取单线联系的方法；逐步转变“左”的活动方

式；讲究斗争策略。例如“倒孔运动”时，群情激愤，势不可挡，要上街游行，要抗议，要示威，硬阻是阻止不了的。阻止不了的群众运动，党有条方针是：参加进去领导，以减少损失；通过运动对群众进行教育。当然，应当估计到“倒孔运动”在当时贵州的政治形势下，是必然要遭受到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打击的。如果我们的进步力量充分强大，有党的坚强领导，能说服群众不上街，自然是上策，但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没有这样的条件。“拓荒社”采取了一些措施：劝说同学们在游行中，不要与军警发生冲突；把一些三青团分子推到前面来参加游进，竺可桢校长十分爱护学生，在劝阻不了的情况下，亲自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使特务不敢在游行中随便下毒手。当然事后国民党没有放过这个事件，还是借口逮捕了一些人。这样，学生运动在浙大，也像大后方许多地方

一样，转入低潮时期。

二 一九四二年夏到一九四四年冬

一九四二年四月，南方局组织部派我到贵州。当时是这样交待的：贵州地下党受到了严重破坏，是从省破坏的，原因还没有查清楚。你们去后，如果接触到贵州地下党组织，绝对不要发生横的关系；并且说，你如果能在贵州站稳脚跟，再派人去重新把贵州地下党组织建立起来。

我先到安顺，那里有我一个叔伯哥哥，叫李振翩，在军医学校任细菌系主任和血清疫苗所所长，军衔是少将。我是共产党员，他是国民党员。我父亲曾拿钱供他上过学，他结婚时没钱，连包袱等都是我母亲给他准备的。就凭叔伯兄弟这点关系，对我就起了掩护作用。他安排我在血清疫苗所任技佐，负责做生理食盐

水。我就这样在贵州找到了职业，初步站住了脚。

李振翩在二十年代跟毛主席一起在湖南搞学生运动，他一九七三年回国探亲时，毛主席接见过他。当时，周总理还为他对我起过掩护作用表示了谢意。

我来贵州的时候，南方局要我在三个月后给南方局去信，看看能不能站住脚。三个月后，我就用暗语给南方局写了封信，说我能站住脚。然后南方局就派赖卫民同志到安顺，带来了十二个从外省转到贵州的同志的关系，要我们去查找，去接关系。我和赖卫民这一级组织什么名称也没有，这是为避免破坏。去年，看到毛主席一九四二年六月给南方局的指示，其中讲到“今后两年将很艰苦，很困难。要求大后方党的省委、特委一概取消，只留县委、区委，必要时，县委、区委也可以取消，只留

支部。”才知道中央的精神就是如此。当时，还有平行组织，单线联系，转地不转党等组织原则。那十二个人的关系由我和赖卫民两人负责。分工他在第二线，我在第一线。由我出面去联系、去领导，如果出了问题他再上来。我开始在安顺呆了一年，他就在安顺附近普定县中学教书。

第二年，李振翩可能是怕我连累他，就跟我谈，你还应该去学习，就是将来共产党当了政，也需要学工的。我建议你学工，最好是学电，“电是抓总的”。这时，我和赖卫民也在考虑，在军医学校活动不方便，不如去上大学，有寒暑假，便于活动。于是，我就化名李振铭，于一九四三年夏考进了浙大。

赖卫民带来的十二人的关系只找到五个，分布在贵阳、安顺和遵义。其中，浙大有两个人，一个是吕东明、一个是卞坤。他们都已经

有两三年没有党的关系了。我一九四二年暑期去浙大和他们接关系，当时都是单线联系，不能成立党小组。我先找到吕东明（他住在新城的教师宿舍）。因南方局交待过，卞焯这个人很活跃，可能在浙大会暴露，你先去了解一下她出事没有。东明介绍情况说：“活跃分子里有卞焯这个人，没出事。”后来我又到杨柳街女生宿舍去接卞焯的关系。谈话是沿着老城外那条河一直往西，边走边谈，走得很远。河边不时出现水车，转灌着河水发出嘎嘎嘎的声音。谈到黄昏才回来。

当时，我和吕、卞谈话内容是先听听浙大的情况，再传达南方局的指示。大体上主要是分析政治形势，传达党的“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现在《毛选》第三卷上是四句话，前面还有四个字：“隐蔽精干”。那时我们没有听到。在《周选》里面，

一九四二年一月的《建设坚强的战斗的西南党组织》一文中也没有那四个字。还有就是作为这个总方针具体化的一项政策——“三勤”政策，就是勤学、勤业、勤交友。东明是个好的典型，他交友很广泛，左中右他都有联系，学习也很好，很多情况是他提供给党组织的，一批进步分子也是通过吕东明联系上的。

这次联系后，应该说浙大的党组织已开始建立。

一九四三年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提出调查研究的问题。于是，我和吕东明就在浙大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卞婊这时已离开遵义去昆明）。通过调查研究，我们分析浙大有这几个特点：

第一，跟西南联大相比，地方条件不同。昆明有龙云为代表的地方势力，与国民党中央的矛盾十分尖锐，蒋介石几次想搞掉龙云，都